

20世纪革命叙事视角下的理想城市建设

——彼得·霍尔《明日之城》读书报告

王宇哲

(北京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京 100871)

七个城门的底比斯是谁建造的？

书本上列了一些国王的名字。

石头和砖块是国王搬的吗？

还有巴比伦，一再被摧毁

是谁又一再将她重建？

(布莱希特,《一个工人读历史的疑问》)

一、引言

20世纪城市建设的历史是不同的城市规划理论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生态下的实践组成的复调叙事，而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巨著《明日之城》(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以下出自本书的引文仅标注页码)以惊人的洞察力精准地选取了从“想象之城”、“梦魇之城”到“褪色的盛世之城”、“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的十三个视角, 将20世纪不同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按照思想的演进及其相互作用的最具逻辑性的顺序来进行组合”(第6页), 从而构成了观照20世纪城市建设发展脉络的复眼。

在阅读《明日之城》的过程中, 除了城市规划理论自身的发展和演进, 我隐约可以感知到作者行文的另一条重要的线索, 也即20世纪前所未有的、影响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及其与不同城市规划理论的相互作用。作者在最后一章“永远的底层阶级之城”中写下了这样的警句: “城市规划的历史不能与促使城市规划从中产生的城市问题的历史分离开来”(第478页)。城市规划的历史永远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态息息相关, 而20世纪的历史正是以某种广义上的革命叙事为基调: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建立具有空前影响力的政权的努力; 民族国家反抗殖民者的统治、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斗争; 底层阶级和弱势群体对于平等权利的呼吁以及大众舆论对他们的强烈关切。站在21世纪初的今天, 当我们回望“业已退潮的20世纪革命叙事”(戴锦华老师语)以及与之伴生的城市建设历史, 我们或许能够从“昨日之城”中找寻关于“明日之城”的构想, 诚如克罗齐所言,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限于篇幅, 本文主要讨论柯布西耶的“理想城市”规划在实践中何以遭遇惨重的失败, 以及社会革命对于理想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 希望以此对《明日之城》的内容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and 阐发。

二、柯布西耶的得与失: 阶级分化下没有乌托邦

彼得·霍尔在“塔楼之城”一章开篇便给予了柯布西耶极为尖锐的评价: “勒·柯布西耶所做的恶事在他逝后还活着, 他所做的善事则可能与他的著作一起被埋葬了”(第228页)。柯布西耶式的理想城市如何在实践中遭遇极其惨重的失败? 作者在“塔楼之城”一章的后续章

节对此展开了抽丝剥茧的论述。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于1885年出生于瑞士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在31岁时迁居巴黎。作为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的创始成员，柯布西耶认为“建筑必须如同机器一样，是功能性的，是真正由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行生产的”（第229页），坚持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具体地，柯布西耶试图提高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交通并规划大量的开敞空间，从而建设一个实现了完全的阶级隔离的现代城市。更深层次地，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论基于强烈的功能主义和集中主义。所谓功能主义，在于柯布西耶完全忽略人类生理、情感的需要和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以激进而高效的方式重建城市，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传统城市的种种弊病。而所谓集中主义，在于柯布西耶无条件地信赖中央政府的规划，认为人民对于城市规划方案无权置喙，只是在具体执行细节上拥有发言权。

然而，柯布西耶宏大的城市规划却“在实践中异乎寻常地不成功”，作者在书中对柯布西耶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头脑简单的极端利己主义和政治上完全的天真使他很难理解自己的失败”（第236页）。柯布西耶“政治上完全的天真”体现在何处？我们不妨以严格遵循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教条而建成的“准柯布西耶城市”巴西利亚为例，分析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论在实践中遭遇惨烈失败的原因所在。巴西利亚是20世纪50年代巴西政府规划建设的新首都，由巴西现代建筑运动的先锋人物卢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耶规划建设，严格遵从了柯布西耶式光辉城市的布局，而“没有任何专门的人口预测、经济分析、土地使用进程表、模型或者制图”（第240页）。巴西利亚这座乌托邦式的城市迅速面临了一系列未曾设想的问题，例如车辆拥有量增多带来的交通拥堵、行人与车辆的矛盾与高速公路对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的割裂，而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严重的阶级分化和对立，贫民窟包围了一度光鲜的巴西利亚，穷人和富人被前所未有地隔离开来，导致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是“富人和穷人总是被彼此隔离的国家里，创造一个无阶级社会的梦想的终局”（第243页）。

柯布西耶规划在巴西利亚的失败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当我们剖析柯布西耶失败的原因，可以意识到其乌托邦式设想的根本缺陷：柯布西耶设想一种无阶级冲突的、阶级完全固化的城市形态，而一个存在着强烈阶级分化的乌托邦终将崩分离析，或者走向反乌托邦的黑暗之中。但柯布西耶的局限性也是某种普遍的历史局限性，正是20世纪的阶级革命实践不断证明着处理阶级问题和社会矛盾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意义。当我们梳理《明日之城》全书的逻辑，可以看到作者对此的深刻认识。作者在第一章“想象之城”开篇即指出，城市规划运动中各历史事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几乎是前提性的”（第5页），当柯布西耶等人忽视阶级差异和社会矛盾、试图凭空建立一个作为理想城市范本的乌托邦时，失败的命运便是历史的必然逻辑，而20世纪的阶级革命史也不断证明着上述事实。巴西利亚的规划者之一尼迈耶在晚年认识到“（巴西利亚的）规划被歪曲了，只有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执行它”（第243页），这也正是柯布西耶“政治上完全的天真”之所在。

三、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以苏联的早期城市规划为例

当我们把柯布西耶规划在实践中的失败与苏联在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加以对比，能够更加显著地意识到20世纪的社会形态变革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城市规划的实践。

在苏联推进社会主义城市建设的早期，柯布西耶等欧洲众多现代主义建筑师和规划师与苏联的城市规划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¹，苏联大量吸取了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理念，并与马克

1 李浩：《193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建设——关于“苏联规划模式”源头的历史考察》，《城市规划》2018年第10期，第77-85页。

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述相结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极为成功地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付诸实践，而其关键在于计划经济逻辑下的阶级平等和公有化革命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铺平了道路，因为“（柯布西耶等的规划方案）和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但是在保存土地私有制和应用资本主义的方法管理城市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解决上述城市建设中的主要问题的。”¹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下打破阶级对立的壁垒，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才能发挥其独特优势，而“在民主和市场的混乱中去实现城市美化”（第243页）不啻天方夜谭。

四、总结

正如作者彼得·霍尔在“塔楼之城”一章的末尾所指出的，柯布西耶的塔楼之城“完全是用于满足中产阶级居民的”（第272页），其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实践中尖锐的阶级对立，试图以绕开社会革命的途径建立一个阶级矛盾激烈的乌托邦，而这已被证明是最大的城市灾难。而另一方面，苏联的实践又证明了理想城市的建成并非天方夜谭，而阶级分化的消弭和社会革命的完成是柯布西耶式理想城市建立的必要条件。

1 《苏联城市建设原理讲义》，转引自许立言：《中外城市建设史：苏联-乌托邦传统-工程学传统》课件。